

新認識叢書

1948

第一輯 第二種

知識份子

田家蘇著

新知書店印行

舊







論知識份子

田家蘇著



新第  
認識叢書  
第一輯  
第二種

新知書店



新認識叢書

第一輯 第二種

論知識份子

著

發

發

者

行人

行所

田

沈

新

特約經售處

聯

漢口·重慶

營

書

店

香港軒輊詩道三〇四號

知

書

店

上海北四川路一九九九弄

靜

芷

家

蘇

·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

國民三十三年六月月初版

國民三十三年七月二版

(S) 2001-3000



8569  
37  
弁言

就在這一次剛結束的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有一個隨軍記者而兼作家（他們姓名我一時忘記了）寫了一部報導性的文學製作，書名叫作「阿丹諾的鐘」(The Bell of Adano)。其中所描述的是美軍登陸意大利領海裏一個叫作「阿丹諾」的島上的故事。情節大要是這一枝登陸小部隊的美國軍官如何熱心主宰這個島上的居民，要他們按照這一位小小的中級軍官的意旨改變舊有的生活。

這自然只不過是一部文學作品，而且範圍只說的是一個小島，但這却又是一部暢銷的文學作品，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確乎象徵着美國壟斷集團中人一相情願地幻想着的「美國世紀」的一個角落。他們癡心妄想，但類這一片「阿丹諾的鐘」聲響遍世界。

果然，世界已經有不少地方響着這個鐘聲了，——可惜的是這鐘聲只是製造災禍的警號！東西兩大文明古國——希臘與中國——正在這警號之下奮發着起衰振廢的大勇，高吼出文化再生的雄壯聲音，掩蓋住這代表垂死的西方文化的「阿丹諾的鐘」聲顯不出音響。偉大的中國人民吞聲抑鬱了不少年代了，在過去悠長的歷史歲月裏，中國文化上也曾有過一種聲音，那就是舊時代中國士大夫所服膺的「天將以夫子爲木鐸」的孔丘的木鐸

國家圖書館



002432676



之音。這聲音既然是由「木鐸」發出來的，自然沉重而低澀，這就是「中庸之道」，是麻痺中國人民沉沉長睡的聲音。

今天中國人民從沉沉夢魘的睡境裏醒過來了，它要擔當起「人民世紀」交下來的大任。它不要再聽木鐸之音，也不要聽「阿丹諾的鐘」聲，它有它自己的健壯的新聲了。這裏偏還有那象徵着「阿丹諾的鐘」的司徒雷登這個牧師，他在中國擔負文化第五縱隊的任務已經有三四十年了，所以他又很懂孔丘的木鐸之音在中國的妙用。然而，西方就有過名言，說是「距離教堂愈近的人就距離天堂愈遠」。這垂死文化的代表人牧師先生儘管不辭辛苦，到處玩弄他的魔法——其實到頭還不過一場夢幻而已。

這牧師又添上了外交官的身份，而這個身份却得之於以戰爭為職業的馬歇爾將軍的噓植。職業軍人而擔當了主持美國外交的大任，這在美國政治史上是破天荒第一遭。這第一遭就洩露了美國傳統的大轉變，它的最近的命運已經交由戰爭販子們去把持。今天在中國象徵着外來災害的司徒雷登，只不過是戰爭販子陣營裏的一名渺小走卒而已。

所以，我們必須要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幾個月來甚囂塵上的對「知識份子」的號召的聲音。實質上這是外來災害對於中國知識份子的最大侮辱。

是從這一個理解基點上出發，我們寫了這本「論知識份子」的小書。



目次

- 一 知識份子的社會性質……………一
- 二 中國知識份子的當前處境……………七
- 三 現階段若干中國知識份子的類型……………一五
  - 一 表現形態的種種及其源流的概說
  - 二 士大夫型
  - 三 買辦型
  - 四 士大夫買辦的混合型
- 四 中國知識份子的出路……………四







## 一 知識份子的社會性質

「知識份子」這一個名辭，今天只有在像蘇聯那樣的國度，纔有比較準確的社會含義。他們擔任着知識勞動或者精神勞動的工作，與那擔任着體力勞動的工人和農人鼎足而三，構成營養與發展社會的諧和的整體。至於在其他有階級的國度裏面，它的社會屬性就有些紛亂歧出了。儘管他們在形式上也還都是以知識為職業的一批人，可是由於隸屬階級之不同，對於「知識」的看法已經有了不小的差異，聯帶着他們勞作的深度和方向，對於社會的功罪，也就有了很大的區別。加以他們苦樂不均，身份不一，對於個人和社會的展望很難擺脫階級蒙蔽的影響，於是表現在工作態度上也呈為各色各式的奇觀：有的熱忱，有的敷衍，有的索性胡鬧扮演成爲澈頭澈尾的知識騙子。這些情形都是和社會制度，社會秩序，和歷史的發展階段，政府的階級性質等等有密切的關係的。所以，「知識份子」並不構成一個社會階級。

但是，由於現代社會職業分工的複雜，作爲以知識為職業的知識份子，儘管他們隸



屬於不同的階級，却又可以從相同的職業部門上發生了某種程度的相同的利害關係，和某種程度的相同的生活方式與意識形態。所以，他們實在又構成了貫穿不同階級的某種社會階層。

這些個知識份子構成的社會階層，作為職業層來說，它們擔當着社會生活的某種任務。而這些任務對於社會發展之為功為罪，固然主要決定於統治機構的階級性和不同的歷史時代，但是作為知識份子的各個人，却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責任感。在階級社會裏面，他們是以出賣知識為職業的；而那承受的買主，說得矇矓些，是國家社會，說得明白些就是支配這個國家社會的階級。假使是在一個自主而自信的資本主義社會，他們的知識必然主要地要配合這個社會的生產要求。在一個殖民地的社會，他們的知識就配合着宗主國的生產需要。至於一個封建性的社會，它本身不可能鼓勵現代式的生產事業，因之它必然早經淪落為殖民地。獨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它形式上彷彿有了自主權，而它的生產任務，在幕後是受到帝國主義的支配，在開發規模上，管理上與效率上必然表現為落後停滯等敗象；於是而它裏面的知識份子，儘管有了各樣各式的現代式



知識與職業部門，但那知識必然表現爲和社會脫節的現象。這本身已經是「自了漢」式的知識份子的悲哀，然而，一到這社會有了強大的人民力量奮起遠大的改造社會的鴻圖，逼迫着知識份子反省到他們的社會性能的時候，那就不是僅僅悲哀所可以自了的了。

所以，知識份子的社會性質，在不同社會的不同歷史階段，各有不同的變化內容，不可以囫圇吞棗地當作一例看待的。

原來，知識份子構成的社會階層，在階級社會裏，絕大多數出身於小康和富有的階級，他們和那廣大的體力勞動者羣，多少是處於利害對立的地位的。但他們之間，對於知識的社會功用的看法，以及對於知識工作的態度，却又有不少的距離。大抵富有者和資產壟斷者的知識份子，他們只拿知識當作是維持和發展他們的社會優勢的工具或武器，他們很少朦朧的觀念，同時却也就根本缺乏追求真理的熱忱。他們對人民的態度，起碼是漠視，多則敵視。至於小康的知識份子，他們本來是在上層階級所把持的社會秩序之下獲得了他們的知識和社會地位的，從生活的慣性上寧願接受已成的秩序而不以爲怪。可是，正因爲他們只不過「接受」這個秩序，而并不「主持」這個秩序，所以他



們容易保留住比較客觀的態度以對付這個秩序，甚至於可以幻想着自謂超於這個秩序之上。這些條件都形成他們在工作態度上比較地虛心，比較地認真，却同時也比較地容易流於空洞。於是，各階層的各個知識份子，對於人民的利益，可以隨主觀與客觀條件的變化而有不同的態度。

所以，知識份子的這些個社會階層，在統治者主導階級發揚向上，配得上算是代表社會向前進展的時代條件之下，他們的工作效率容易得到順遂暢適的發展。儘管他們始終難於擺脫階級的蒙蔽，意識上虛構了許多自解自譬的幻境，抹殺了勞苦人民的社會功績，但他們的工作誠意與責任感，至少在主觀上是還不肯褻瀆自貶，甘心幫凶，或者妄作遊戲人間之想的。這是一個社會欣欣向榮的時期，也就是「人安其業」，「人得其所」的時期。

但是，一旦到了統治者階級走到了日暮途窮，無法掩飾它那貪婪、凶狠、醜惡、無能的本質的時候，尤其是在他們喪失了民族的自信，不惜出賣民族利益以挽救自身的滅亡的時候，知識份子的隊伍裏，自然就起了分化。依照中國舊式意識朦朧的說法，這也



就是「人心思亂」的時候。其實，何嘗是人心思亂？恰好相反，這正說明統治者階級的末路，被壓迫者的廣大人民清醒了階級的自覺，爭取一個死裏求生，爭取一份合理的社會秩序。這時候分化了的知識份子，那優秀的一部份，必然就轉換方向，睜起眼睛看見了人民，看見了這個養育社會，啓發人生價值的真正源泉。他們從痛苦的生活的體驗上，認識了他們和廣大人民的共同的社會基礎，厭棄了那原有的所謂「秩序」，甘心作自身所屬的階級的叛徒，情願依附人民，發揚人民的尊嚴與真價。至於那習於慣性生活的一部份知識份子，只顧一己的利害，寧願依戀骸骨，甚至不惜暴露他們不惜向貪婪、凶狠、醜惡、無能的統治者羣乞討顏色，却就成爲一份十足的幫凶的醜面目。

這種知識份子的分化與轉化的情形，正說明社會的變革；他們分化與轉化愈是深廣，愈是社會劇變的標誌。而且愈是產業落後的社會，這分化與轉化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就愈加顯著；因爲產業落後的社會，組織必然鬆懈，人民奔赴再造社會的鬥爭，需要知識的武器也更加迫切。這裏就存在着精神力量的重要，存在着對於知識份子的嚴重考驗了。這是一種精神突躍的考驗，可又是精神澄瀟的考驗。是作人還是作狗，是向「天堂」



還是向「地獄」，就在這分化與轉化的程途上判分了。

社會發展與人類進化，由野蠻愚昧以進入文明，常常留下些知識份子的名字，道理就在這個地方。而且歷史愈是進到近代與現代，這個痕迹愈是顯明；原來人類進化是愈趨愈見複雜，要求知識份子的精神提鍊，奔赴光明也就愈強呵。

假使由於日暮途窮的統治者階級暴露了它公然出賣民族利益而不稍顧惜的罪惡，這時候却已經有了強大自信的人民力量向挽救民族沉淪的努力上面發展，這時候就已經談不上知識份子的先驅任務，而是光明對於整個知識份子階層的號召了。這種事例，經過了反法西斯的世界性戰爭，簇擁出一個鮮明的「人民世紀」以後，更是數不勝數的情況，簡直是汹涌澎湃的洪流了。

我們不妨單舉科學工作者的時代覺醒為例，他們的工作是一兩百年來被公認着作為知識份子追求絕對真理的象徵，而無關於人間的擾攘的。可是早在這回戰爭爆發以前，已經就有了不少的科學家，覺醒了他們的社會功用，知道并不是無偏無袒，并不能超然於社會是非之上。經過幾年戰爭的磨練，他們更能清明地澈悟；戰後各國乃至國際科學工



作者協會這樣的組織，其精神是大異於從前，刻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無愧於接受客觀真理的科學家的稱號的。單就英語裏他們自命的身份是Scientific Workers，（中文一般翻譯裏寫作「科學工作者」，其實是應當更準確些譯作「科學勞動者」的）這一件事的本身，已經是很重要的一個轉變。他們寧願認清自己也是一種「勞動者」（Worker）的身份，指明他們和一切「勞動者」是同盟隊伍；而却放棄了舊時代的糊塗想法，認為「勞動者」是賤民的稱呼，不屑與為伍的。

## 二 中國知識份子的當前處境

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之下，中國的「知識份子」這一個名辭，不幸大體上仍然相當於舊時所稱的「讀書人」或者「書生」這樣的人物。這理由正因為中國到今天還是一份小生產經濟的社會，他們的知識不會在改造生產事業與生產關係上表現成就。他們假使不能將他們的知識聰明用在替人民着想，如何開發我們廣大的人力，豐裕社會的財富，而只是泄泄沓沓，依附於貪慾無厭，醜惡無能的豪門秩序，那他們的身份無非只是豪門的



弄，臣與爪牙而已。對於整個社會說，他們是有損無益的寄生蟲；對於被榨取被迫害的人民來說，他們一樣也是人民的敵人了。在這農村破產，都市窒息的情形之下，他們自負的那一點所謂「知識」，其實充其量仍然不過是書本知識而已。既然這樣的「書本知識」對於社會危機無能為力，那就說明了知識與知識份子的破產。

我們不要錯認了中國的知識份子已經有了豐富的職業部門，也像人家產業進步的國家一樣，我們的知識職業也是應有盡有。要知道這些正是我們社會病象的表現，這些個職業部門，實際上只是虛有其表，而且也只限於幾個較大的都市裏纔始存在。這些本都是隨着外來侵略者逐漸輸入進來，其初本來是由外來侵略者和內在的壓迫者配合着他們的需要逐漸設立的。這些個部門之中，多數都帶着垂死的資本主義的毒性，經歷了豪門政權二十年的歪曲培植，經歷了一場抗日戰爭的考驗，更是弱點畢露。但是，同時我們可又不要忽略了另一方面的發展：正是在這半封建半殖民地體制之下培植而成的知識份子，他們又正是這個體制趨向崩潰與滅亡的程途上的推動力量。愈是他們能夠克服原有的毒性，發揚知識的健康成份，這力量愈加雄厚。



說教育，各級學校的教師構成知識份子數量最大的職業單位，這是中國知識份子因循着「萬世師表」的傳統職業。既然「萬世師表」型所附麗的傳統社會條件，禁受着襲擊的風波，所以它的精神內容，無法保留住傳統的完整性。但在另一方面，儘管教育理論與制度鬧得門道繁多，而實際上總只能配合着豪門政權的需要，或者只是花瓶式的點綴，致令學生所學非所用，或畢業即失業，因此到頭來這個職業始終只能表現為書本傳授的主要形態。這些動盪的因素，又使這一個職業成爲流動性極多的職業部門。今天更鬧成一個舉國搶救教育危機的局面，其反映舊有秩序的崩潰，更是一種鮮明的標誌了。

說農業，可以說自從有了現代式的農學知識份子以來，他們一直都沒有和農村或農民發生過有效的關係，除去極微量的，小型的，缺少效率的試驗以外，他們始終也只能是居留在城市裏的農學書生或者農業官吏。

說工業礦業，自始就以買辦型的姿態建立起來，是凡由外資控制的部門，那物資開發與工程知識的配合都比較地調和，生產技術的管理也比較地健全（自然不必說到那資本主義經營的本質建立在剝削工人的利益的一件事上）。這些部門裏面的知識份子，自



然以外來人物爲支配者，中國人物只能以學徒式的僕役身份貢獻他們的知識技能。至於國資經營的部門，那生產所需的知識，大抵主要由熟練工人所擔任，而中國自己的工程師名義之下的知識份子，實際上或者仍然只能有些書本上的知識，或者受到管理上封建性的牽掣與限制，不能盡其所長，終於也只能是工業書生或者工業官吏。這情形在官營事業比民營事業更要普遍而嚴重，到今天大量「劫收」了敵僞企業以後反轉鬧成個百業凋敝的狀況之下，更加暴露無餘了。

說交通與公共衛生的事業，知識份子普遍地都得不到知識與技能進修創造的機會，而只受到舞弊與腐敗的鼓勵，愈是上層，這情形就愈惡化。這些方面，官僚作風就更甚於書生作風了。

說法律與銀行會計乃至一般綜合性的經濟事業，那更是直接牽聯到政治制度與社會風氣，無論爲朝爲野，都只能教人聽到一派謊話，再不然就是乾脆攤開書本，只見長篇大論的文章，或者閉門造車的大量表冊了。

說新聞、出版、以及一般性的文化事業，那是誰都明白，一黨政府永遠一相情愿，



想控制得水洩不通，永遠作豪門政治的喉舌。同時也正在這一方面豪門政權暴露了它的空虛無物與毒燄薰天，永遠遭遇全國人民的唾棄。知識份子在這一方面表現，最爲姿態複雜與鬥爭尖銳。健康進步的努力愈是橫遭迫害，愈見堅貞，永遠忠於真理，忠於民族，忠於人民，所以永遠在迫害重重之下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與逐時發展。儘管黑色的陰險與黃色的墮落受到官方的鼓勵與畜養，永遠掩蓋不住進步的光芒。這些部門的工作本來是傳統書生的正行，結果就正是這些部門的知識份子最能保住他們向正邪兩途分化的傳統精神，真理面前不可能有絲毫含混。因之這就成爲反映中國社會一面混亂與一面光明的最鮮明最尖銳的指標了。

綜結上面所述，中國社會由於它結構的本質始終還沒有脫去二千年的封建遺毒，百年來擋不住外力的侵凌，又推演成爲半殖民地的苦境。知識份子的際遇，儘管總難脫去「讀書人」的故態，却也無時無地不顯露出自我反省與對待環境的矛盾與衝突。就在這矛盾與衝突中展開了進步與倒退，光明與黑暗的鬥爭。這鬥爭由個人的，散漫的形態，逐漸發展爲社會的，組織的形態。其間又由於社會條件的演變，他們可以表現出動搖，



逃避，反動，或者忠貞，堅定，百折不回等等情形。所以，這個鬥爭的歷程，艱苦而長久，無時無地不在激變之中。而這激變的內容，在性質上，深度上與廣度上都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代。傳統的「士大夫」型知識份子不可能再見舊時代的生活條件，除去依附法西斯性的豪門作幫閒幫凶的清客以外，一例趨於沒落，新進的「買辦型」知識份子，千嬌百媚地出賣他們新式的買辦知識，更構成豪門政權中幫凶的爪牙。但他們畢竟只能是少數人，那逐時增多的大多數知識份子却躲不脫被迫害被侮辱的命運，這纔激勵着追求真理，趨赴光明，不敢推辭他們的時代使命，配合着健康發展着的中國社會的需要，克服下舊時代「讀書人」或者「書生」的弱點，發揮他們應有的社會效能。

然而這過程是艱苦的，所以表面顯露的知識份子始終難於脫掉「讀書人」或者「書生」的積習。這「讀書人」或者「書生」的稱呼法，從另一件事情上還可以得到一種補充性的說明，就是直到現在，一般社會流行的說法，仍然叫「求學」或「上學」為「讀書」，「讀某某學校」。中等教育以下的階段且不去說它，直到學生進入大學，人們仍然可以說是「讀工科」，「讀農科」，「讀電機系」，「讀化學系」等等，反正一切求



知識的行爲，仍然稱之爲「讀」。雖然也可以說，這不過只是舊習慣流傳下來的一種說法，實際上我們的高等教育也還知道在「實驗」上推進。但大家對於進軍事學校學習軍事知識可並不叫作「讀某某軍校」「讀砲兵科」等等，可見得事實上已經不偏重在讀死書的知識部門，大家也改換了「讀書」的稱呼了。而且就算有的大學能夠注意到學理與實驗的關聯，而究其實際，那叫作「實驗」的課程，仍然也還只能限於教科書性的一般標準型的實驗，對於啓發性創造性的督促，仍然不受注重；自然更談不上解決具體問題的實踐知識。——所以我們說，知識份子的名辭大體上仍然相當於舊時「讀書人」或者「書生」的人物，這是大體不差的。

這是社會條件所決定下來的一種狀態，社會條件不改變，這種狀態是不會改變的。——所可改變的只是「書生本色」的那一點傳統精神，逐漸從中國「知識份子」的身上褪淡，不得不分化與轉化而已。

兩百年前中國一位薄命詩人黃仲則寫下過一聯名句，說「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這句子描繪出中國傳統的知識份子在人生旅程上的心事與社會性能；說得



是這麼坦白，這麼生動，可算得舊式「書生本色」的最簡鍊的寫照了。

可是一到社會走到歷史變革的關頭，作為時代呼吸與聲音的表達者的知識份子，就不能只是薄命詩人所描繪的情況，而提鍊出另一型的本色書生。

這一型的本色書生，是隨着時代與社會要求自我改造了的知識份子，用舊話說固然可以說他們是「見利思義，見危授命」，是「富貴不淫，威武不屈」，激昂處是「慷慨悲歌」，悲壯處是「成仁取義」。但用今天的術語來說，是他們澈底認識了必須與人民同命，撇除個人和階級的狹小利害，貢獻他們的知識與生命，爭取中國人民的解放，爭取人類光明的明天。

中國知識份子的優良傳統，就是首先要明辨是非。既然知識份子屬於「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一羣人，他們所能表現的工作只能是偏於知識活動的一面，而「明辨是非」就正是這種勞作的中心神髓。他們的是非感可能由於階級的蒙蔽而看不分明；但是那主觀上「明辨是非」的要求可是絲毫也不能加以折扣。每當社會變革的關頭，也正是階級矛盾暴露到無法掩飾，危害到整個社會生存的時候，這種時候的知識份子就更決



不是空言「明辨是非」所能卸下自譴的責任，而必需作更大的努力了。尤其是到了民族的危機，中國知識份子的傳統更能夠奮起大勇，克服下自己封建意識中「致君澤民」之思，而自然就知道接近人民以搶救民族主權爲第一急務，不問誰家誰姓是否野心勃勃要奪江山了。爲了這一個神聖的目標，他們作得到肝腦塗地，萬死不辭。岳飛，文天祥，史可法這樣的一羣名字值得中華民族永遠謳歌者，道理就在這個地方。

降及現代，中國社會起着本質上的變化，民族翻身的大任，百年來流過了無窮無盡的人民和知識份子的熱血。這工程是超世界紀錄性的艱苦，中國的知識份子也就在這程途上起過無數次的分化與轉化；社會變化的旋轉愈亟，他們的分化與轉化的節拍也愈趨愈廣而愈深。這是鮮明地記載着的歷史痕迹，最值得今天的知識份子深思的。

### 三 現階段若干中國知識份子的類型

(一) 表現形態的種種及其源流的概說

從以上所論，現代中國知識份子隨着中國社會的多故與激變，不得不發生分化與轉



化。這是邏輯的必然，是中國社會艱苦而曲折的發展的一角象徵。假使沒有這分化與轉化，而仍然停滯在死沉沉的舊時代的傳統裏面，反倒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就最近三十年來說，我們不妨取「五四運動」作為這個分化與轉化的轉捩點，因為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國知識份子體察到內外客觀形勢的誘發，配合着主觀意識的覺醒，集疊着複雜的歷史與社會的因素，爆發而成的重大事件。但這並不是說「五四」的以前及以後，就沒有這種的分化與轉化；只不過對於知識份子來說，那以前以後的變化，比較地都顯得隱藏些，混和在一般的社會運動裏面，不及這個運動的影響顯著而已。

知識份子和他所配備的各色各式的知識，單以知識份子的身份，從此必須更深入地面對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課題。就從對於這個課題的答案上，已經就鮮明地呈露出分化與轉化的標誌來，三十年來常常是筆墨議論的聚訟之點。甚至對於「五四運動」本身的性質的考察，也成為論爭的焦點。一種意見認為，既然這個運動是由知識份子的實際行動，打擊了賣國的封建官僚，撕破了他們的無恥的嘴臉，戳穿了他們的腐朽不堪的「紙老虎」，這纔發生了社會力量，所以，無疑地，這主要就是一個「社會運動」，而且是



政治性很強烈的「社會運動」。而另一種意見呢，却一定要扭住說，既然這是由知識份子幹出來的，而知識份子是「純潔的」，「天真的」，「不過問政治的」，「忠心於文化生活的」，所以這只應該算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點點成果，而并不是「新文化運動」的正面文章。順着這後一種高見推論下去，這般「新文化家」勢必要儘力開脫這個運動的政治性，恨不得要說它（五四運動）究竟富有政治性正成爲它的「污點」。這樣，恰正好輕重顛倒，這般軟骨頭一心只想抽去這個運動裏面有分量的硬脊梁，偏偏要誇張它那啓蒙性的脆弱部門，庶幾乎好替自己蠅營狗苟的所謂「文化生活」傅粉塗丹，來掩飾起自覺或不自覺的反動的政治生活。

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分化與轉化，一直就從這兩種不同意見的分水嶺上運行發展；誰有勇氣繼承那硬脊梁的傳統，加以明確的發展，誰就把握住了中國得救之路；誰要扭扭捏捏，一心只想在「文化生活」裏找隱蔽，而且又不甘寂寞，偏偏要誇張「文化」的空靈性，借「文化」作終南捷徑，誰就墮落爲反動政治的弄臣與倡優，辱沒了知識，辱沒了文化。這裏面是沒有絲毫躲閃含糊的可能的。至於進步的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它



本身就含有進步的文化內容，一直是活生生地在發展着的。

推移到了今天，這也就是說，抗戰結束之後，中國的大地之上，光明與黑暗的勢力——人民與豪門外寇挾持奴役的勢力——經歷了幾度政治妥協的回合以後，終於爆發為亘古未有的規模的軍事搏鬥的今天，中國的知識份子又面臨着一個新的分化與轉化的轉捩點，其廣度與深度，更超過了「五四」當年。

自從一黨專政以來，這個分化轉化運動，一直就在默默中進行，誰也不去理會：這本是正常的，乾脆的現象。偏偏到了今天，平地冒出來「知識份子」這個名辭，突然裸露。報紙的社評與重要新聞，雜誌的廣闊篇幅，都着實拿着這個題目赫然渲染了一陣。同時這些「知識份子」們還不僅以「立言」自了，更急迫得左顧右盼，或明或暗地奔走聯絡，懷着異樣的心理錯綜，着實忙亂得不可開交。這是一件新的事情，一個新的場面；但却又是一件病態的事情，一個尷尬的場面。這病態，這場面，本來有它的病源的，一下子還難望脫體；但從病根和病象上看去，是近於忽冷忽熱的惡性瘡疾的那麼一



種病。爲什麼瘡疾而又是惡性的呢？因爲它的發作並沒有規律的週期，而只有聽病源毒素的擺弄。要得病象消除，就必須先消除了那病根，這就得要仰仗中國社會的體魄茁壯發展，豈得起鐵硬的脊梁的時候了。

誰都看得出，這病源是從太平洋彼岸侵入的；但是它植根埋種，却已經有了不少的年代。它傷害着中國社會的健康，本來早就在或隱或顯地表演。今天恰好到了它大肆毒性的時候，這纔禍延「知識份子」忽冷忽熱地忙亂起來。這就是今天這個場面之所以爲「新的場面」的所在。從前英國侵略和日本侵略的時代，都還不曾這樣突出式地捉弄中國「知識份子」的。

揭露這「新的場面」的毒素代表人，就是那位隨時隨地改換身份，改換國籍的司徒雷登。他忽而美國大使，忽而中國的大學校長，忽而基督教的傳教牧師，忽而杭州市的「榮譽公民」。——但是他的最確切的身份，還是時刻口中念念有詞，吐出「阿門」那樣的咒語的基督教牧師。

基督教的上帝要到創世的第六天纔精心精意地造出人來，而這位基督教的傳教牧師，



可是一口氣就嘔出了整串整串的中國知識份子。誰說歷史不是在動的發展中造成的，今天的傳教牧師，不是比鴻濛初闢的混沌太極時代的上帝，還要神通廣大得多麼？上帝導演的戲法哪有這麼細緻與生動？

「上帝說，我們要照我們的形像，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上帝就照自己的形像造人。……上帝就賜福給他們」。（「舊約」創世記第一章第二十六七八節）

這位傳教牧師說：「我們希望中國的知識份子及受教育人士，例如若干大學的教授，喚醒并指導全國人民，在新憲法之下積極盡其責任，……亦可僅成立若干團體，以倡導若干有關改革之主張及進步運動。……渠等似有一極大之機會與責任……」云云。（見二月二十日及以後連續四五日間的上海各報）

於是我們的這樣的「知識份子」，立刻就領略到這個「極大的機會與責任」，沸沸揚揚，「成立」了這樣的「團體」，「倡導」了這樣的「運動」；而且一連串一連串地發佈了名單，而且貨真價實，幾乎全部都是「大學教授」。至於其中麀雜着三五個失意



官僚和標準買辦，那只能算是「九五」小折扣的膺品，是最克己的生意經了。一批批的名單上面，大體上都是行幫嚴整，地域分明，排排坐列在新聞紙上，的是愛煞了傳教牧師，自慶他的「法力無邊」。

傳教牧師的神通，不只噓出了這麼多的「知識份子」，還表現在這些「知識份子」所起的反應的多樣性上。他們像柳枝似的能紛繞指柔，像泥團似的易於揉塑，讓傳教牧師在祭壇上燒燭默坐，自然就面對着盡態極妍的表演：有的堂堂皇皇，「成立」了「團體」，而且還訂出了三十二條經國濟世的綱領；（綱領中甚至於還照顧到中國的男男女女應當如何配偶）有的提出了長篇大論的文章；有的座談；有的研究。妙就妙在這多樣性的姿態，都不肯跳出傳教牧師的掌心，都環繞着他的主題：『具體的說，問題在增進一般平民的福利，且使其不受極端反動自私份子與極端激烈份子的橫暴手段的威脅』。（見所發表的「告中國人民書」）

然而，「極端反動份子」的隊伍裏面可又有人不以爲然，他們微微酸着嘴臉，也表示出可憐的異議來了。說是，中國政府自來就是和「知識份子」合作的，向來沒有排斥



「知識份子」的一回事。這意思是說，牧師所見未免有了偏差，多少和事實有些出入。本來，今天政府的衰衰隊伍當中，不都論噸論噸地稱得出「知識份子」的數量來麼？

此外又有另一種異議，擺出另一種微微酸着的嘴臉，着實恭維了一番中國知識份子的清高，自來就有一種講究在野發揮清議的高尚傳統，決不肯自貶身價，追逐入朝的官職。這樣就側面露出了對於牧師好管閒事的慫恿之情。

我們實在認真分析起來，這形形色色，在現象上看去似乎多樣多姿。但考察它們本質上的共同要點，却也非常簡單，那就是喪失了階級的自信。對於中國社會發展的看法，儘管也可能厭惡着豪門的專政，怕的這專政的延續，連帶斷送了自己階級的前途，可是思想上筋斗亂翻，終於不敢跳出美國的掌心，甚至於卑怯地幻想着仰仗這掌心的魔法，撐持着自己「出人頭地」。

儘管如此，可是像這樣的「知識份子」羣中，在階級本質上，思想內容上，和各個人的處世態度上，又呈現着頗為複雜的歧異，值得作進一步的分析；而不應當囫圇抹殺，一語斷定他們一定都是甘心反動。恰好相反，他們之中有的是自信潔身自好之士，



只因爲受了生活小圈子的銅蔽，受了思想上盲視的負累，擺不脫脆弱的「情誼」的糾葛，這纔忍心犧牲色相，廁列在可恥的名單之內的。

人們常常拿天空的超速飛機和地面的牛車並行於中國的社會這件事，說明中國社會的複雜性，夾雜着若干世紀的社會進程並列於同一時代。其實這個形像的比較還需要有一些進一步的補充，那就是儘管我們天空上飛行着超速的交通工具，可是這工具並不是我們自己所製造的，而牛車却是我們的土產土造，無情地指陳着我們這個活社會的歷史博物館的本質。

我們的知識份子，今天大抵都是學校出身。可是這學校制度都是模仿着人家不同的社會裏面的，或者根本是由外力嵌入的，在不同時期裏強曳強湊着推展開來。其結果正和飛機與牛車并行一樣，學校的產品也是七拼八湊所成。不只學校和社會脫節，很難湊合樁頭，而由此所培成的知識份子也是習染多型，反映出異樣複雜的不諧和性。再加上留學生們的多源性浸在裏面混糅激蕩，替社會強添了許多與它真正需要漫不相干的職業部門，散佈些爭奇鬥怪的所謂「文化」，更增加了無謂的混亂與矛盾。——這一切都得



由中國社會負載在肩頭，因而阻滯着它的健康進展。

下面我們試想從與社會意識有關的觀點上，分作幾種重要類型，說明現階段的若干中國知識份子的形態。由於前段所述的理由，這些類型並不能嚴整劃分，實際上相互間儘有不少的交流叢錯。爲了說明的方便，姑作大體上的區分而已。

### （二）士大夫型

中國遭遇到西方外力愈趨愈緊的迫擊已經超過了一百年，到今天還保留着「士大夫型」的知識份子，這就說明中國社會發展的遲緩性。但是他們秉承着傳統精神中有益的部份，加以與時代需要相配合的調節，對於中國社會的推動，過去曾經不斷地起過積極的作用，這却也是不磨的歷史事實。這一點必須要受到正確的恰如其分的認識；可是又千萬不可以渲染誇張。

不能正確地認識這個作用，就可能喪失了不必要浪費掉的一部份社會力量。雖然這力量在今天已經很微弱了，但是爲了社會發展的理由，仍然值得有選擇的珍惜。另一方面，過分誇張了這個作用，却又足以引伸極有害的影響。這關鍵就在於他們能夠善用傳



統精神的優點，力求與時代需要相配合的調節。這也就是說，幾時他們能克服他們個人的和階級的私慾，站在被迫害的廣大人民的一面，幾時他們就盡了推進社會的積極作用。

大體上說，中國的士大夫型是和英國的「紳士型」有點彷彿的東西，同是封建社會的產物。他們是依賴土地私有制的不勞而食者羣，他們在現代城市（多少資本主義化了的城市）裏面的生活，多少保留着一種游離的情態，遇到不順遂的時候，每每心頭哼哼着「信美非吾土兮」或者「田園將蕪胡不歸」？的調子，總想念着那土地的靠山。「歸老田園」更常是他們必然的歸宿。惟其在城市保留着一種游離的情態，所以他們還能比較地不執着於市儈性的得失，而比較地能透見社會的遠景。也惟其是這種游離的情態，又教他們見事不能細密，而常常顯得一派朦朧。這情態向壞的方面發展下去，是在農村裏只能是腐敗舊制度的頑固份子，笑傲那無內容的「優越」感；至於混在城市生活的罪惡圈子裏面就迷失了方向，而且懶惰無能，甘受市儈的擺佈。假使向好的方面發展，他們也可以作到「有所不爲」，縱然「一簞食，一瓢飲」，也還能「不改其樂」。更進一步，「有所不爲，然後可以有爲」假使再肯向社會光明的遠景奔赴，他們就成爲革命的



先驅了。

階級社會裏，任何社會制度都是自己崩潰滅亡的製造者；封建社會的覆亡，除了物質的主要條件以外，人的條件也就是這樣由封建社會造成。士大夫型的優秀之選就擔當了這樣的一部份任務。中國士大夫所講究的「明義利之辨」，「不愧於屋漏」，英國紳士所講究的 *good manner* 與 *Fair play* 動輒喜歡誇耀的精神傳統，正是這點子動力的來源。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是世界同性質革命中最不徹底的一型，然而英國紳士們保有足夠的勇氣蔑視美國市儈者，也還是這點子東西。

可是，英國社會始終是一份民族自立的社會，像這樣的一種紳士型，要取叔本華的一個譬喻應用到他們身上，倒是非常恰當。他說人們之相處儼如一羣豪豬：爲了取暖必須聚在一起，而彼此遍身是刺，又必須保持距離，不能親密相依。正因爲不事生產的地主紳士，在城市是依附着大地主的封建專制主爲生的，大家只需向「一人」乞討顏色，彼此之間除了周旋揖讓之外用不着打什麼交道。因此培養了一份頑固的，而却是原則性的，自尊心。待到社會演進爲資本主義制，紳士們的社會性能儘管有了改變，可是剝削



他人勞動爲生的本質並沒有兩樣，所以他們的知識活動逐漸增添了內容，而那頭頂上擁戴着的一頂虛權的王冠，仍然保留着作爲紳士們精神優越的符號。誰要衝撞了它，就是衝撞了「帝國的光榮傳統」。

中國近代的士大夫可就不幸沒有這樣的命運，一份爭取民族自主的擔子，背負了三百年，到今天還不能卸下。士大夫中的頭號敗類曾國藩發揚了他們的惡德到了能力的最高峯，強從腥羶民族的統治者那裏乞得一角政權，更爲後來買辦性官僚開闢了滋長的天地，爲禍中國社會，直到如今。其間幸有章太炎先生所代表的一型，不囿於腐儒的卑怯，不矜持學術的成就，而却汲汲於爲民族氣節，爲行將沒落的士大夫啓示了發展優良傳統的範例，善盡了他的時代責任。章先生出入牢獄，流亡海外，半生檄召民族革命的熱情，務必推倒異族統治而後快。功成以後還屢次痛批奸雄袁世凱的逆鱗，不肯稍假辭色。雖然晚年不免衰憊，留下了一些書生意氣用事的痕跡，但是「見林」要見它的全貌，不當苛求單株的林木；而且還得溫習章先生的時代，估量他到底成就了多少事功。

曾國藩與章太炎分立兩個極端，中間恰好鑲嵌上一個康有爲這麼一型的士大夫，



也體現了他的時代意義。極端型而能有出色的成就，不能求之任何一個士大夫，也不能求之於任何一個時代。這裏倒是康有爲串演的一員角色，容易傳授下他的衣鉢。

今天我們分析現階段士大夫型的中國知識份子，從精神遺產上追溯，按理不妨提出上面所列的三個突出的類型。但是實際上，時代的條件，社會的條件，畢竟變化太大了，三個類型都不可能有依樣葫蘆的繼承人。曾國藩的幽靈不可能復生，衰竭了沒落了的典型士大夫，誰敢擔當起鎮壓那完成革命大業的廣大農民（已經不是歷史上暴動的農民）的責任？即使竟有這樣的妄人，又有誰肯付給他這個責任？

章太炎的作風今天也成了絕響，因爲今天轉化了的知識份子，即使本有士大夫意氣縱橫的氣質，也必須痛下工夫，磨練成爲科學性的戰士，不允許感情泛溢，妨害了可能擔任的事功。果然竟有其人，這裏面必然要滲進了不少分量的假貨色，實在走了原樣。

剩下來康有爲這一型人物似乎還可能不太走樣，也算懷抱着一肚皮「上致君，下澤民」的壯志，想替國家報効一番。祇是，今天偏又已經是民國三十七年，向哪裏去遭遇到知己的「聖君」呢？就連那改良主義的本質，也演不出康有爲似的魄力，說出口來動



輒露出了狐狸尾巴，難掩捉襟見肘的窘態。康有爲雖然沒有什麼大的成就，但他那「百日維新」的表演和終於失敗，總算作了一場暴露中國社會本質的試驗，強調指陳改良主義之沒有前途，而且後來到底還沒有人肯誣蔑他甘心爲外敵作一名「第五縱隊」的隊員。這後一種差事畢竟是買辦型知識份子的拿手好戲，不能記在士大夫型的賬上。所以，康有爲的一型也畢竟不可能再有典型的繼承人；惟有他那失敗了以後假借「保皇救國」的幌子張羅幾個錢花花，同時還到處阻撓革命的進行，今天口唱「經濟研究」的有一些「學者」們倒還學像了幾分。

時代實在變化得太大了呵，試比較比較下列兩段文字，從康有爲的嫡傳門生梁啟超到今天的大公報社論的作者，即使這改良主義者的士大夫該是已經墮落成了什麼模樣。

梁啟超在他的「現政府與革命黨」一文中說過這樣的話：

「革命黨所持之主義，吾所極不表同情者也。謂其主義可以亡中國也。雖然，吾未嘗不哀其志。彼迷信革命之人，固國中多血多淚之男子，先國家之憂樂而後其身者也。多血多淚，先國家之憂樂而後其身之人，斯亦國家之元氣，而國之所以立於天地也。其



爲爲迷信此可以亡國之主義，有激而逼之者也。激而逼之者誰？政府也。以如是之政府，非底於亡國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萬一於不亡。此彼等之理想也……使彼等而誠有罪也，則現政府當科首罪，而彼等僅當科從罪。……乃政府全不自省，而惟以淫殺爲事，甚且借此爲貢媚宦達之捷徑，舞文羅織，作瓜蔓抄，捉影捕風，縱騎四出，又極之於其所往，要求外國以破國際上保護國事犯之公例；如最近長江一帶疊次之黨獄，與夫要求上海領事引渡其黨員，要求日本政府驅逐其黨首，類此之事，日有所聞。嘻！是不可以已乎！」

這話是在革命思想與行動已經澎湃發展着的一九〇七年說的，一派感情的泛濫，顧不到說理的嚴密。不問改良主義的作法到底能行不能行，而只知道照例在口頭上向「現政府與革命黨」兩面開弓；梁啓超的確算得士大夫型「中間路線」的開山祖師。但就在這一段文字裏面，作者也還不敢掩瞞他的真是非感，對於社會發展的看法雖然一片矇矓，而對於獻身革命的人，終於難抑讚頌之情。所以興奮之餘，冒出與其聽現政府胡鬧，幾乎寧願將國家交給革命黨去亡掉的意見。（他忘記了那時候的中國是早經亡給滿



洲人了，當時的革命黨正幹的是民族復國的工作。）可見得儘管當年革命已經顯露了人民的力量，中國士大夫還並沒有喪失民族氣節感與階級的自信。今天的大公報可就墮落到衰竭的境地了。大公報的初起，本來以還沒有喪失自信的士大夫的姿態自見。它精神上繼承着梁啓超的脈絡，而補充了一些時代的調節，裝出一份以「立言」爲中心事業的氣派，所有士大夫傳統所更着重的「立德與立功」都彷彿附麗在這個新聞事業裏去表現。而骨子裏畢竟不是那麼一回事：自從投靠了「新政權」以後，作風上逐漸添進了買辦的成份，愈趨愈濃，愈趨愈不能自掩。抗戰結束以後，它更爽性拿狐狸尾巴裝飾作冠纓，認爲無恥也是「光榮的」德行了。最近爲美國作應聲蟲的自由主義更表現了無恥之大成，面對着梁啓超當年論「現政府與革命黨」這同樣的課題，該報三月八日的社評竟畫出了這樣的招供：

『在腐敗而有限期的政府與健全而無限期的政府之間，我們是寧選前者的。』

這是士大夫型的知識份子轉化爲買辦型的一份良好標本，他們是愛上了「腐敗的」，而不願意要「健全的」政府了。至於那「限期」的說法，根本是陪襯文章；但也就道出



了澈底買辦化的願心，祈禱着美國來縮短這個「限期」，家奴的身份保不住時，寧願選擇洋奴的身份了。

自然，大公報還并不能代表沒落了的士大夫的全部，中國社會裏還存在着別樣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意識。他們憂傷着士大夫的盛世已經死滅，却又擺不掉那一股子思古的幽情。他們知道不可能像曾國藩康有爲的那麼凸出，却又總在懷念着「一鳴驚人」的便宜算盤，精神上總抵抗不住那「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的幻境的誘惑。他們比較地能夠「有所不爲」，不必像大公報所代表的那麼「陣陣不離穆桂英」。但他們也就因此忽視了社會的動態發展，而寧願求之於寧靜的「堯舜之世」。這是一種「處士」風格，以不輕於一仕而保持與「處女」性同樣珍貴的貞操。儀表上是一派道貌岸然，骨子裏總或多或少地隱藏着不可告人的心事。不能進而作「王者師」或「王者友」，只好退而談心論性，或者高談「中國文化」。對於社會的功罪，他們因了際遇的不同，作了瑕瑜不等的表現。分析起來，他們可以有下列的幾種姿態：

(A) 標準大地主代表的典型，是虛藏用的嫡傳子孫。



舊唐書九十四盧藏用傳裏畫着如下的一份臉譜：

「盧藏用字子潛，尚書承慶之姪孫也。……藏用少以辭學著稱，初舉進士選不調，乃著芳草賦以見意，尋隱居終南山，學羣毅練氣之術。長安中徵拜左拾遺。……又遷黃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工部侍郎，尚書右丞。……藏用工篆隸，好琴棋，當時稱爲多能之士。然初隱居之時，有負儉之操，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爲「隨駕隱士」。及登朝，趨起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以此獲譏於世。」

這是中國有名的「終南捷徑」的故事的由來，但是對於今天的嫡傳的子孫，應用起來，却不能不加添些某種的修正。今天的終南山上不再有好管閒事的「老實」農民肯替這樣的「隨駕隱士」作義務宣傳，今天的朝廷也不會有徵召「山林隱逸」的「聖駕」。所以今天的盧藏用可能是「五四」時代的大學生，也可能作過頌揚蘇聯的講演，因爲必須如此纔可能造成「賢達」的資本，值得「革命的」朝廷的注意。假使他再肯填一張入黨志願書，進一趟「中央訓練團」，那麼，他的新式「終南山」的準備工夫，可以說得上已經純熟齊全了。但是他還能夠沉得住氣，還是安於「教授」生活，偶爾出幾趟「講學」



的欽差，貼補幾文兌匯美金的資本。再加以著書立說，談談「新理學」，說說「應帝王」，揣摩揣摩「中國本位文化」，解釋解釋今之領袖原本就是古之帝王，講來混沌模稜，三分人境安頓在七分鬼域裏。這樣的工夫深到，今天自然不妨遠走高飛，去到花旗國宣揚中國文化了。

我們拿這樣的人物當作大地主的代表型，因為他們仗着封建官僚世家和封建土地制度的靠山，培養得一套玩弄玄虛的意識工具；同時又記得「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的古訓，不肯輕冒政治的風險。但是自身所隸屬的階級是一份從任何觀點上都無法辯護的東西。這幾方面的因素造成了這一姿態的士大夫以「講學」為主要業務，善盡保衛舊制度的責任；講起「學」來還不屑於零零碎碎，一定要組成整套的「體系」，儘量造足了「隨駕隱士」的資本。

(B) 多少要算關心中國社會發展的有心人，但總擺不脫那一套死鑽牛角尖的意識形態。這一套形態從古老社會裏生根，愛的是「中庸」，討厭的是「偏激」。口頭說說的是「留有餘地步」，心裏忌惡的是一切清算分明。他們對當朝黨始終保持着距離，正



因爲此黨一向自稱「革命」，今天更鬧得舉國赤貧，毫無餘地。也因爲始終對當朝黨保持着距離，今天倒甘願它的衰落；又由於這衰落，他們就認以爲這正合了他們的思想與預見。他們不從階級力量的消長上看社會變化，一心只想強拿表面現象配合他們的理想。他們自覺或不自覺炫耀的那一套思想，其實正說明了地主的頑固性，說明他們本接近於龍旗或者五色旗時代統治者那一羣。

像這樣的士大夫，律身行己，可能很尊重「節操」，但這正因爲他們接近的統治者已經死滅。可是也由於這節操，他們還能維繫落後階層的人望。這個，對於糾正常朝黨的倒行逆施，是仍然有了他們的某種作用的。

何以見得他們是接近龍旗或者五色旗呢？他們中最極端的代表，總要認定中國人是靠「特有文化」過日子的，而這「特有」就決不能和「外來文化」相提並論。中國人倘使能夠再關起大門來，這塊土地仍舊是一片義皇盛世。他們以爲中國文化一向是講究「通儒」治理人羣的，所以今天的中國最好交給像他們樣的思想家去處理，旁的人可憐只能見其偏而不見其全，那是都要誤事的。他們也可能在今天的民主運動裏顯過身手，



可是偏要認爲人民選舉不合於中國文化的口味！他們也可能作過「農村運動」，但那「治術」終於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治術是「五綱已墜」之後假借北洋軍閥的力量推行的，所以是五色旗式。

他們也可能多年講說過「民主」，提倡過「寬容」，尤其推重着「理性」。但他們却忘記了他們的那「民主」與「寬容」的由來，是承繼着保皇失敗以後對付革命黨人的法寶，是向革命者要求對地主的「民主」與「寬容」的。至於「理性」，他們更忘記了這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突擊封建制度裏王權與教權的思想武器，當時決不是用作嚇退革命情緒的。這迹象向源頭追溯，的確是「保皇」的餘風，只是還不屑於保今日之「皇」而已。所以，這是龍旗式。

龍旗式與五色旗式的思想，經過了改頭換面的調節，在今天居然還能起一點推進中國社會的作用；中國社會推進之爲牛步式，這一點就是鐵樣的證明。

(C) 行動還能認清方向而思想搞亂了頭緒的民主人士。這一姿態的知識份子按理是值得鼓勵的，但也只能受到有分寸的鼓勵。他們的社會身份屬於知識份子的上層，行



動算是能夠「認清」了方向，而其中還是夾雜着不少成分的不純不淨的東西。至於思想意識，竟是鬆散蕪雜，漫沒有下過工夫。爲了批評今天中國的病象，他們常常喜歡引證些中外的史事，說明今不如古。譬如，他們可以舉出唐代制度，天子並不能獨裁，「中書舍人」可以駁回天子的草詔，「門下省」也可以有斟酌之權，並不像今天一人的獨斷獨行。或者宋代新舊黨的政爭，他們也認爲比今天還要「民主」。又如，他們可以讚賞普希金當面向沙皇侃侃而談他對於「十二月黨」人的關係，而沙皇並不拿他治罪；或者慨嘆今天中國連「羅亭」型的知識份子也沒有。例似這樣的思想方式，我們時常可以從他們嘴裏聽到。其實這些話，作爲政論家論事之助，或者不失爲一種俏皮的說法。可是要作爲文化思想來傳播，那就犯了絕大的時代錯誤了。因爲我們並不要，也不可能，將中國退回唐宋之治，或者模仿舊俄皇朝的規模呀！

面對着今天這樣的局勢，他們有意無意中竟露出了追念前朝之情，所以，這也還是一種士大夫的姿態。



假使我們說士大夫型知識份子到今天只能是衰微而且曲折多姿地存在，那麼，買辦型的知識份子今天可就算達到了短命的黃金時代了。這也就是說，那封建的意識形態本來建立在身份特權上面的，在表面上已經被普遍地否定了，只能依附着豪門暴政作醜惡化裝的表演；可是買辦意識却是建立在經濟的特權上面的，而這經濟特權呈現着加速集中的形態，其形成又是由於謂「革命的」方式倚仗着外力巧取豪奪而來，在短短二十年期間之內吸盡了全國人民的財富，開創了世界未有的殘暴掠奪的紀錄。所以，買辦型的知識份子及其意識表現，對內，總含着有殺機，不管他裝得怎樣地偽善；而對外，總顯出那一份西崽相，不管他打扮得多麼漂亮的服裝。要用聞一多教授遺留下來的考語，外毒是借刀殺人，內毒是狗仗人勢。買辦型知識份子的任務，就在從文化思想上遮掩那刀光，粉飾那狗態，儘管他們過的是那一份乞討餒餘的生活，他們今天可是達到囂張無恥的頂點了。

買辦的本義是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商品經紀人。無論商品的性質是嗎啡，是海洛因，買辦推銷時張貼的廣告，總得要說是上等的補品。買辦型知識份子販賣思想文化的任務與作用，和這個仍然是異曲同工。買辦的目的在於撈錢，倒不一定有心販毒；可是碰着



有販毒的生意好做，他們也只好當作補品推銷。同理，買辦型的知識份子的目的在於取得社會地位，倒不一定有心傳佈些有害的思想；可是，到了帝國主義者一定要他作應聲蟲，作傳音器的時候，他們也就顧不得許多了。假使他們再是出於自發的曲意逢迎，其爲人其用心還能問麼？

誰都知道中國過去是衆多帝國主義國家虎狼踐踏的一份共同殖民地，這裏就久已成爲代表不同帝國主義利益的各式買辦孳生傳種之鄉。爲了配合侵略的需要，衆多的帝國主義者照例各有一套對華文化政策。其配合的情形隨侵略者本身的社會條件而有不同的姿態。如日本似的先天不足的法西斯強盜，顧不得也來不及下一番水磨工夫，只顯得一手持劍，一手挾着「天紘一字」「大東亞共榮圈」的魔鬼經文（大家都還記得，日本可也早就在中國有過「同文書院」「文化研究所」之類的機關。）至於美國，那是從土裏不帶封建種子，放手澈底資本主義化了的國度，而且它又是帝國主義中後起之雄，不需要採取江洋大盜體裁的侵略方式，一開始就是一副僞善的笑臉。有如他們自己人拉鐵摩所說，美國早在十九世紀末年強調的「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簡單的註釋就是「我也要一



份」( me too )；到今天可就成爲「只要我一份」了( me only )。配合着這樣一份作風的文化政策，內容自然與衆不同，而且隨了時代的推進，今天顯出異樣發展的成果了。高度帝國主義化了的市僧們料定了佔得經濟上風，不愁產業落後的土地不入它的掌握，只除了「攻心」之術需得多下工夫。「長線放遠鷄」，多財善賈的市僧們，本性是都懂得收買人心的一套法術的。旁的且不說，單只那混在強盜夥幫裏索去了的庚子賠款早在一九〇八年就由美國國會通過了，算是「退還」中國。這議案是當時的美國總統接受了一個在中國傳教三十年的老牧師的建議所提出的，到今天整好四十年，「威尼斯商人」式的債主該要連本帶利一齊收回去了。畢竟這巨大的「歇洛克」氣派不凡，在四十年前中國的社會條件與文化條件之下有誰能料得到今天的負擔有這麼沉重！父欠子還，這纔真教作俗話所說的「子孫債」呢！

然而，「見仁見智」，竟有天壤之不同，讀者有見過潘光旦教授所著的「民族特性與民族健康」一書（其中絕大部份，正是前面所說的那個傳教牧師所著 Chinese Character's 的譯文）前面刊載着吳景超教授的兩三萬言長序的麼？那裏面就可以看出他們對於



這位「退還」賠款建議人是充滿着多麼深澈骨髓的感激涕零之情。這些「學者」們還並不是爲自身感激，他們是要全中華民族感恩圖報，這裏面據說正關係到「民族健康」這樣的經綸學問呢。

這正是「欠債還錢」的「善良人」，也正是我們買辦型知識份子的一份上好標本，同時也是美帝國主義對華文化政策獨步千古的好反映。

過去中國文化界常常有思想紛亂，頭緒繁多的情形。在某種意義上，那也可以說是這國際逐鹿的殖民地的反映。親日的歡喜「東洋情調」，親德的愛尼采黑格爾，親法的說狄德羅與盧梭，親英的是那一份凜凜的紳士氣，加上一點點費邊主義。至於親美的呢，三十年來一貫是三個「杜威」和杜威的「實驗主義」；杜威又是提倡自由主義的，所以還有這一型的自由主義。事情發展到了今天，果然由紛亂歸於一統，今天到處是一片「自由主義」之聲了。今天的這位傳教牧師司徒雷登，這位美國豪門集團的文化賬房，比起當年那位建議「退還」庚子賠款用作對華文化事業的傳教牧師來，可就幸運得多了，他就能顯出一口氣噓出成串成串的「知識份子」的神通！



從文化淵源上追溯，作爲買辦型的知識份子，其內容還並不這麼簡單。除了傳教牧師的神通表現的因素以外，他們的主要成份，其實還是由士大夫型蛻變而來。原來，作爲生意人的買辦階級本身是並不需要什麼文化的，他們也沒有培植文化的氣量。他們初在中國社會出現，是屬於封建社會棄民的一流，投身事外，博得一份西崽的身份；雖然有「教」可「喫」，那精神上總是有點自慚形穢的。隨着侵略者勢力的擴大與深入，他們逐漸昂起頭來，不只贏得了一份傲視同族的經濟地位，而且飄飄然自覺精神上也佔了優勢。但他們畢竟是與文化生活很少緣份的，所以一般地都還擔當不下替侵略者傳佈文化政策的「大任」。侵略者覷透了這一點，於是對於這一「大任」的對象人，他們還得向本有文化傳統的士大夫型知識份子裏面追索。三百年前的天主教走的是這樣的路，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的階段以後，惟有美帝國主義有足夠的富力與眼力在中國再走這樣的路。——這就是美帝國主義首先獨唱「退還」庚子賠款這戲碼的重點所在，也就是今天市僧們收賬時利潤豐厚的由來。所以，今天買辦型的知識份子能夠替美國老闆在思想文化上出力的，主要的正是士大夫型蛻變而成的一羣。他們只有思想意識可以賣錢



還債，並不像買辦豪門的那麼樣已經把握住中國的命脈，有足夠的斗膽將整個國權拍賣給人家，犯不上談什麼撈什子「文化」。倒是真正生意人買辦階級的本身，他們平時過的是一份自信「奉公守法」的生活，今天一般地都被買辦豪門傾軋得轉不過氣來，他們反轉被擠出積極的反動圈子以外了。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矛盾發展法，今天豪門以內及其外圍的買辦型知識份子羣，正是這樣的一批光桿子官僚政客，而却不見得準是屬於從前道道地地的買辦生意人。這一批光桿子買辦型知識份子，仗着他們買辦性的知識，洗刷了士大夫型知識份子的矜矜，可又保留着士大夫性格黑暗面的自私，狡詐，與無恥。他們在中國早經結成了行幫，售與豪門，發展到了今天，已經形成一股不弱的惡勢力，是今天爲害社會的相當重要階層。舉凡貪污，反動，劫收，掠奪之彌天禍害，他們是重要的幫凶。董顯光抗議司徒雷登的說法，認爲政府原本就是和「知識份子」合作的，也正是指的這一批虎俵。他們老行少效，愈趨愈惡，駸駸焉將舊有士大夫型可能保有的民族氣節與「有所不爲」的操守，清洗到蕩然無絲毫餘存。



但這並不是說，像這樣的圈子以外就沒有買辦型的知識份子了。恰好相反，這圈子以外的正是美帝國主義今天號召的主要對象。他們因了多種因緣，比較地能夠保持「清白」，寧願「居野」。然而他們的文化修養與方向正和「在朝」的一批是半斤八兩，反正認爲中國的病根是在於人民的「愚昧」，與帝國主義絕不相干，而且他們根本就不承認「帝國主義」這個科學性的名辭，因爲他們的文化辭典裏找它不出。他們朝野同臭，原本就是聲氣相通，教授與官品之間，他們自來就保持着圓融自在的走馬燈式的轉換。

惟其在朝的買辦型知識份子的作風已經教美帝國主義者蹙額搖頭，眼看支持不住它的「友邦政府」，「司徒雷登這個文化賬房纔想起了在野的一批。這位文化第五縱隊的隊長是懂得中國文化的行情和知識份子在中國社會的作用的，（馬歇爾正是看中了他的這一點資本纔派給他這個差使）暗中奔走提調還嫌不夠鮮明，顧不得明目張胆地干涉中國的內政，只差伸手把住中國政府的筆桿，寫出買辦型知識份子中應當羅致入朝的人物的名單了。惟其他是久於文化第五縱隊的業務的，所以他還能說得比較地模稜，儼然他的愛護中國還超過了任何中國人，這纔垂涕而道。偏偏那位美國豪門的更夠材料的大賬房杜



魯門，怕的司徒的說法發生了含糊與誤會，索性點明出來。他說：『中國自由主義人士甚多，一部份且曾在美留學，他們構成所謂中國知識份子，此即美國認為擴大政府基礎應予羅致者』。（三月十三日大公報）中國知識份子公然蒙受的侮辱，在近代史上還沒有過像這樣情形的前例，連日本侵略者算在內，也還不會說得這麼露骨。然而也真苦煞了中國的「知識份子」，他們正在擺佈戲法，滿臉孔的一本正經，說是要「研究」中國的社會經濟，純然是學術文化性的活動，偏偏美國的新聞記者一點也不肯代為隱瞞，報導「此間一羣工業家，教授，財政家與記者等已成立一協會，計劃起草一「新中國藍本」以響應司徒大使要求中國知識份子團結的呼籲……」（三月二日合衆社北平電）一點點祕密的香味都放散得毫無剩餘。在野的買辦型知識份子歷來還只肯以「文化人」面目自見的，今天就這樣地無法掩蓋住傀儡的性能。難道人世間還有所謂「傀儡文化」麼？知識份子的文化活動到了只能「響應」外來侵略者的武器與金元，人們還能期望從那裏得到什麼東西麼？這只有叫人回憶起顏子推描寫六朝人的話來：「彈琵琶，學鮮卑語，以此服事公卿，無不如意」。猖獗儘管可以猖獗，那精神衰竭的悲哀可也就到了不堪的境地了。



世界文化史告訴了我們，文化不能只是博物館，不能只是書庫裏的死書，它要能指示民族乃至人類的明天。買辦型的傀儡文化只能是白紙黑字的翻版，只能是留聲機片的複製。更何況那白紙黑字的原版，那留聲機的底片，已經都是「炒冷飯」的花樣，它自己都已經成爲翻版與副片了呢？

在從前，買辦型知識份子並不是天生就是買辦性與傀儡性的。當他們初露頭角的時候，先有滿清末年維新派的「洋務」，糾正着封建性的頑固份子；這是開明士大夫微露買辦傾向的時期。到了「五四」前後發展爲「舊文化的重新估價」，聲音是那麽響亮，行動是那麽有力，一切都顯得朝氣清新，很發揮了些推進社會的作用。這是士大夫而意識到民族資產階級革命任務的時期，其中只有少數份子具有較強的買辦意識。「估價」原本是商業術語的借用，按理估價之後接着就應當是着手「清算」，這纔是光明進步的邏輯發展。然而買辦型的知識份子却從此回頭，面對着向「清算」道路發展的正途，却只能喊出「全盤西化論」，喊出「摩托車文明的好處真是一言難盡」，這樣的消失了自信的聲音。這只能說明「估價」的作用是爲了「招盤」，而不是爲了健康自主的「清算」。



了。到今天「招盤」果然招來了他們期望的買主，自然正是他們心安理得，只能有傀儡性鸚哥性的表演了。

傀儡的提線人，鸚哥的豢養者說，他們正在為西方文化的命運擔憂，他們在幹着保衛西方文化的盛業，這些話其實早在希特勒的著作裏佔了重要的篇幅，今天不過搬到「生意人」的嘴角裏吐出來而已。太平洋彼岸的商業部長哈里曼是這麼說，華爾街所有的大亨們都是這麼說，我們的買辦型知識份子也只會這麼說，他們也成了「西方文化」的衛士了。

「西方文化」到了肺病第三期，只能忙着寫字間的記賬，支票簿的整理這一類事情，只能慌着一團糟，叫囂些垂死之前的掙扎，挺出色厲內荏的胸膛，教平穩謹慎的新聞記者如約翰·根室樣的人寫出了這樣的描畫：「然而戰事一過，污水便反濺到我們的頭上，舉國蠅營狗苟，不可終日。……它在戰時完成了巍巍乎的生產奇蹟，而竟不能供給它自己的人民的住處」。一見「三人出版社」所譯根室著作「美國內幕」卷頭語——我們買辦型知識份子並沒有那樣的「寫字間」可坐，沒有那樣的支票簿可守，却也一樣地



忙亂，一樣地叫囂。

「西方文化」說，人生的意義是「努力」，是「奮鬥」，是「生存競爭」，其實那只是「達爾文式」的「生存競爭」，是將人性的尊嚴降低到向生物界的模仿。我們買辦型的知識份子也只能理解到這樣的「人生意義」。

「西方文化」說，人生的意義是「創造」，是「進步」，而其實質它今天只能創造出新奇的殺人武器，創造出得不到好行情就成山地燒燬掉的財富，創造混亂，創造迫害；進步到懸崖，進步到陷阱。我們的買辦型知識份子一無所有，却仍然羨慕着這樣的「人生意義」。

「西方文化」從前打擊得我們不能抬頭，口裏還要咀罵我們是「一盤散沙」。今天統一了的「西方文化」，仍舊向我們打擊，口裏却又說是「反對強權政治」。我們買辦型知識份子從前只是應聲說些什麼「中國必亡論」，今天又應聲說是「強權是違反理性的行爲」，鸚哥學舌，以侵略者之心爲心。假使今天的中國正在向糾正舊時散漫的弱點方面發展，難道還應當再回復到「一盤散沙」的老路麼？



「西方文化」坐在市僧們的會議席上，說，他們一直是希臘文化「正統」的當然繼承人，與蘇維埃制度勢不兩立；事實上却指頭撥弄着算盤珠子，怎樣縮緊自己人民的褲腰帶，怎樣搬運剩餘的軍火和一般物資去突擊一切愛好和平各民族的國防，掠奪人家的主權，收買人家的敗類子孫。我們買辦型的知識份子裝起一副乞討腔調，也說，世界只有西方市僧們聽着悅耳的那麼兩種國家分類法；一種是「極權政治」（他們裝着不懂那正是人民的民主政權。）一種是他們那樣的「民主」（也就是由豪門把持而且逐漸加緊操縱的）。我們這樣的知識份子還在嚇唬蘇聯，說他二十年來一直是拿蘇聯當朋友看待的，從今天起他可改變了態度了。

像這種樣子的「西方文化」，其實也只有我們的買辦型知識份子還甘於抱着骷髏當天仙。至於西方的夠尊嚴的知識份子，自己都早經唾棄它到毫不愛惜了。經過希特勒的一場蹂躪，更使他們堅定地認出他們舊文化的衰竭了。且不說羅曼·羅蘭那樣的先覺者，也不說科學家郎之萬，畫家畢加索，詩人阿拉貢這樣的名字的轉向，就說溫和而不忘是非感的赫里歐，他最近還說出這樣的話：



「我再說一次，『西歐』的概念，是一種人爲的，並且是可怕的東西。這樣的歐洲的概念，本質上是希特勒式的，並且是非常危險的。」

再說英國「今日生活與文學」雜誌的編者海林，他也提醒到目前英國文化界存在着  
一種撒野放肆的傾向；他說：「這傾向簡直令人感覺到我們彷彿達到了酷似法西斯主義  
時代的狀況。這種法西斯主義，我們本來是企圖殺死它的，但是我們却承繼了它了。」  
然而我們這東方的買辦型知識份子漫不管這一套，却以鸚哥弄舌，承繼着這樣的  
「文化」爲光榮了。

#### （四）士大夫買辦的混合型

依據上面的敘述與分析，士大夫與買辦的兩型知識份子，在今天的中國，已經難有  
完整的類型，而多少都驢和着交流的痕迹。既然中國現狀支撐殘局的勢力是一種封建買  
辦的混合體，其結果影響到知識份子羣中是凡願意保持現狀或至多到改良現狀的，必然  
屬於或此或彼的上面這兩種類型。當然我們稍加進一步的考察，不難發現惟有買辦型的  
改良主義最是祈望外力更加強一步的侵入，成爲名實相符的對中國的獨佔；而士大夫型



的改良要求，比較地多有一點民族意識，自然就可能和中國健康發展的大路合軌了。假使我們再考察這兩種類型中無論是這一種或那一種，他們誰都不可能建立起一套「自圓其說」的思想體系，（這本是社會條件所不許可的）也就可以見出這兩種類型的無可挽救的沒落了。

惟其如此，所以知識份子中夠得上列入上面兩種類型之一的，實際是已經歸入老年的一代。可是比起「五四」時代大家慣好指說的「遺老」來，這內容又複雜得多了。所以這些又都可以稱之為遺老掙扎的變體。

\*

\*

\*

至於數量佔着多數，而年齡都在壯年，那構成知識份子中支撐現狀的骨幹的，他們却應當自成類型，不妨稱之為士大夫買辦的混合型了。他們現在正當分化與轉化的程途中；儘管口頭慨嘆着世道艱難，不歸於楊，則歸於墨，儘管有的還強咬牙關，一口認定楊墨都非正道，惟有他們纔最得「中庸」的靈氣，而事實上他們却已經或歸於楊，或歸於墨了。（形迹上他們又可能有時歸楊，有時歸墨）。



所以，這些是很豐富的一夥，前些時報紙上響應那位亦華亦美的傳教牧師的號召，動輒一大串一大串姓名擺成儀仗隊的，也正是屬於這一夥裏面。他們的身份是教授，「民間」輿論的主持人，企業家，失意官僚，還混雜些貪污騙子等等。

這夥人有士大夫的世故，而無其節操；有買辦的機靈，而無其臉厚。不像正牌士大夫的固執，而沒有標準買辦的那麼狠心。說到這裏，我們還得回頭照顧幾句前面說過的作爲生意人的買辦階級裏面產生的知識份子，可能不及買辦型知識份子的那麼積極反動的道理。這裏有一個字面上的矛盾，須得加以解釋。原來買辦這個名辭的本身，根本就是反民族的。但是今天的買辦階級中，那些老牌號生意人買辦，有的也漸趨沒落。這沒落的過程，或者由於他們的帝國主義後台老板之間的衝突（例如親日與親美之爭）顯出了消長，或者由於他們舊日的「小本經營」逐漸被買辦豪門所吞併。於是「喪家之犬」，反轉可能追念它的真正老家。（自己的民族）。至於我們所稱的「買辦型知識份子」，他們是依靠「買辦知識」爲謀生工具的，他們的經濟基礎不及買辦階級，而其身份根源却屬於沒落得更早的士大夫階級（也就是地主）。所以他們的「文化」水準，大抵比生



意人買辦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較高，至少是更爲複雜。所以他們的意識，形式上像似亂絲攪線，中外雜揉，實質上總是在替「買辦文化」張目，例如「月亮也是外國的圓」等等。戳穿了說，這些主要的就是各國歸來的留學生，尤其是留美學生。因爲不只美國的對華文化政策，自來就是最具遠見，而且美國的侵略方式主要是借文化作掩護的烟幕，留美學生自動或被動地都情願背後牽着一根外線。他們的買辦意識愈是澈底與堅定，他們在中國的「文化」地位也就愈高貴。自然，他們在今天美國氣吞世界的情形之下，也就更是我們第一流「權威」的知識份子了。

\*

\*

\*

現在再說我們的「混合型」。他們既是大體上屬於中年人，這也就是說，他們多多少少都受了「五四」運動的影響。社會是在發展的，「五四」以後的中國社會更是在一浪緊接着一浪的激變中發展的；然而他們却只情願抱住「五四」的那一點矇矓鬆懈的東西。至少「五四」是一場愛國運動，他們却絕口不談愛國行動，寧願心愛那一點空靈的「文化」觀念，甚至於在意識上或者聯帶在行動上已經踏進了禍國或者賣國的圈子裏



面，他們還要說是「五四真傳」，硬教「五四」的明確口號翻轉變成了「家傳祕方」了。

又因為他們大體上屬於中年人，所以他們又大體上都隸屬於前面兩型（主要的是買辦型）老年的門閥。要就魯迅描畫過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那一型，引經據典，動輒舉出美國某某有名人物都是如何出身微賤，又如何憑他們的天才與努力一步一步地爬上去的這一種「爬梯子論」來說，他們是屬於買辦型的。要就我們真正家傳祕方的「喫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這一種理論來說，他們是屬於士大夫型的。混合型知識份子秉賦的這一點東西，倒的確是夠得上「中西合璧」的文化論的：二者都喜歡從個人得失上着眼，都願意蔑視「社會」是什麼狗屁東西，那根本是混沌的一團黑漆！

士大夫型喫苦喫不來，或者已經喫了苦中苦仍然不爲「人上人」，就咏歎起「人生如夢」或「如烟」這樣飄逸的詩句；買辦型爬梯子爬不動，或者爬上幾級後又栽了筋斗，就寫出「人生如賭博」或「如演戲」這樣忿忿的哲理。二者都可以是我們混合型知識份子的人生觀。「烟」呀，「夢」呀，這些就是東方的「靜的文明」；「賭博」呀，「演戲」呀，這些就是西方的「動的文明」：我們的混合型知識份子修鍊得這麼兩套文明，



所以他們是「動靜咸宜」的。

要舉具體的例子來說明嗎？——有的。

在他們爬得正起勁，喫得正苦的時候，——也就是說，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階段，國際帝國主義得到了某種的穩定，而中國的內戰却小規模地打得火熱的時候——誰也沒有聽見他們講什麼「民主」，什麼「理性」，什麼「自由主義」，什麼「人性尊嚴」這一套。今年大概梯子有點不穩，苦藥彷彿近於黃連，這一套「莊嚴」「公正」的理論都一齊搬出來了。

這些理論不只被搬了出來，而且儀態萬千媠妍不一。尤其妙的，是同一枝筆，同一篇文章，都可以說出自擱耳光的意見，連形式邏輯都顧不得完整。這些都暴露出那梯子爬上了半程又狐疑着倒底將怎樣繼續爬法，或者說本以為「苦盡甘來」之日，偏偏又嘗到了苦頭，像這種樣子的「苦心」。用中國的成語來說，「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正是他們「欲蓋彌彰」的心事。希臘哲人勸人要「你自己認識自己罷」，他們引據經典時滿會講這種調頭，而其實却最缺乏這種修養。



「民主」這個名辭已經被褻瀆成了娼妓，這裏且不去說它。

「理性」本來是啓發英法革命的精神動力之一，是這兩度革命勝利了之後，這纔產生了西方「理性」的天下。可是今天這樣的「理性」已經又出了難醫的毛病，那在「西方」繼承了理性的傳統而能夠加以新時代的發揚的人士，已經又溫習起消歇已久的新理性應有的光芒，以求突破那種老理性的錮蔽與毒素了。

然而我們的混合型知識份子中有許多人並不是不懂得這一點道理，却偏要從石頭裏咬出血來，硬要認定他們悽惶錯亂的「理性」當作「遠大的抱負」看待。他們從前隨着洋人嘲笑中國是一盤散沙，今天又怨恨中國有了組織力量。他們在這上面最懂得玩弄文字槍花，於是又從中國本有的辭彙裏摘取了「幫會」這名辭，以嘲笑中國的組織力量。而幫會是總帶有「匪」性的，於是無論爲朝爲野，只要有了組織，就成爲他們眼裏的「幫會」，剩下他們纔是獨得正義理性的「清品」了。以脆弱爲堅強，以無節操爲儻瀟灑，以佔小便宜爲遠大抱負，他們的這一種德性，今天也夠得算是「中西合璧」的了。

至於「自由主義」，與「人性尊嚴」，那「尊嚴」的內容與程度，從上面的分析已



經可以領略其神髓；而「自由主義」更是逢迎了外來侵略勢力，鬧得震耳欲聾了。

他們辦得到在同一篇文字裏，前半段揶揄一切主義都是「半世紀來使野心家雀躍，使民衆寒心的名辭」。既然他們能夠看見「民衆寒心」，可見得他們自己是並不心臟衰弱的；而「雀躍」的人又都是「野心家」，又可見得他們的心是「古井不波」，也不會害心臟亢奮病的。不「衰」不「亢」，恰好就是他們的心境；看來這樣應是人生最高的修養準則了罷？可是在同一篇的後半段裏却立刻露出了心臟衰弱的徵候，（他們是永遠也不會像民衆那樣地「寒心」的，不要看他們筆底下永遠代表了「民衆」。）供出他們「自由主義者」的真心事了：

「政治集團今天的爭執，似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應蓋起怎樣一所房子……最顯明的是最好雙方合蓋……可以兼容兩大工程師的長處……自由主義者本身不願露宿，也不忍見流民露宿，所以誰做主任工程師，只要房子能蓋起來，他們能賣氣力處，都義不容辭。」（引文均見二月七日大公報「社評」）

這裏又顯出無論在朝在野的「幫會」都比他們更有道理，剩下給「自由主義者」



的，只有一臉乏相，乞討左右逢源，永遠有「義不容辭」的福氣了。

總之，像上面這一姿態的混合型知識份子，他們在今天扮演着所謂「自由主義者」正在前台露臉的主要角色。因為正在前台，所以不能懈怠；又因不能懈怠，戲目特別繁重，所以最感喫力，以至於隨時露出馬脚來。說得堂皇的時候，他們是在替國家打的久遠算盤，氣量既恢宏，抱負又遠大；陪襯出旁人都是「幫會」作風，斤斤較量目前淺近的得失，實在不登大雅之堂。但是一到說得洩氣的時候，他們可又招供出支離破碎的精神內容，「不可能也不必有一個完密的理論體系」，十足暴露出悽惶的心事。要用杜徵先生的話來說，他們本來是自負不凡，這纔抬出了「自由主義」的一塊金字招牌的；而結果却「由現實政治退到政治哲學，再退入人生态度。」（見「中國建設」五卷五期）退無可退，自然就捉襟見肘，破綻百出了。——一切都無非指明出他們的嘴巴裏塞滿了「接收」或者「救濟」的肥油，難掩奉命執筆，或者失意承志的窘態而已。

此外另有目前不必在前台表現，而却洩露出正在後台加緊化裝的混合型知識份子，



他們神色上可以顯得比較從容，完全是一派「學者」的氣概。他們可以自劃一片天地，儼然也在處理實際問題。思想可以追求某一種的體系，文字也可以謹慎周密，其中心神髓，就是寤寐以求的「費邊」主義。儘管說來彷彿自成一家之言，其實是不顧今天的時代條件，國際條件，一心只想重走意大利的西斯蒙底，法國的聖西蒙，英國的歐文那一批慈悲心腸的人物的舊路。你假使要說他們犯了時代錯誤的毛病，他們却可以反唇說你不顧中國的社會條件，他們原來也是從具體的社會問題下手的。你假使要說今天中國的農民正擔當着為民族掃除幾千年鋼疾的一份革命大任，不可能聽憑他們「好意」安排，他們却可以俏皮你是「革命高調」，是「強作英雄」。再不然，他們爽性自承是代表地主階級的，不允許你「慷他人之慨」。

這一類的混合型知識份子毫不隱諱那地主階級中天生優秀的救主的姿態，他們敢於當衆鞭撻地主的懶惰與無能，可是一掌一把淚，一擱一心酸，止不住那對於制度之下的犧牲者的悲憫。唯其如此，所以那細針密線的設計，要逼着任是你鐵石心腸也得給予同情的讚賞。



他們自然是知道中國社會發展主流的趨向的。唯其如此，他們的意見，說來彷彿未始不可以配合這個「主流」，却又顧不得考慮這從地主階級利益出發的圖案，究竟要依靠什麼樣子的政治體制纔可以推行。今天的局面，中小地主也和農民一樣都處在吸血與暴力的雙重壓力之下，政以賄成，曲直由槍尖子決定，這些他們也都是熟悉的。也正唯其如此，他們的圖案纔顯出是一套空中樓閣來。他們偏又總顯出是「理性」的化身，是暴力的死敵，就憑這美麗的設計，到底會從什麼地方找出建築的基地來呢？這些却可以規避不提。

要借用西方一位十九世紀大思想家指摘和這相彷彿的高論的說法，正是「它們愈是規定得詳盡細密，就愈是墮入純粹的空想」，或甚至於說他們要的是一套「社會鍊金術」（見「反杜林」）這結果就使人覺得他們的文字只是單純的浪費了。

曾記得文化漢奸周作人，在「五四」以後嚮往過日本武者小路式的「新村」，作文倡說過多年；那「東洋情調」的烏託邦幻想，一直留為「中日文化交流」的某種象徵。然而當年的日本畢竟是一個自主的資本主義國家，它畢竟也還能容忍得下武者小路開闢



一片玩具模型式的「新村」，吸引了周作人的訪問。而周作人自己的「新村」，終於只能黑字留在白紙上面。他本人却推演到今天住進了南京老虎橋邊的監獄裏，而當年描繪得義皇世界似的「新村」這個名字，却墮落到成爲上海洋場上面官僚市僧們建築的馬路「新村」受洗命名的點綴。

今天設計「農村復員」的知識份子，內容自然要比當年的「新村」充實得多。如果我們作不敬的推想，假定那美麗的圖案，或者不免是寄託在金元貸款與原子彈上面求實現的，那就不只是「文字浪費」的問題了。

像這一類的知識份子，大抵出身於安樂地主之家，亦曾浸潤在封建的意識體系裏，頗識「知足不辱」「心安理得」式的情趣，從來很少感覺到生活的缺憾。從這一點上看，他們是十足的士大夫型。但他們在夾縫裏也能接受「五四」在文化上的一部份影響，儘管并未投入積極反動的陣營，却也就鑽入空靈的文化圈中，自然練出一套「學者」本領。他們在意識上逐漸喪失了民族的自信，却不忍想到自身階級的沒落；於是一心只好拜倒在早經向下坡崩潰的資本主義文化門下，販取那不冷不熱的「費邊」主義。到今



天犧牲了「學者」的色相，也出頭過問社會問題；同時也正利用這「學者」的氣概，擺出儼然一副實事求是的情神。至於因此而顯露爲了挽救階級的沒落，不恤放棄民族的自尊，規避「反帝」的任務不談，也就顧不得許多了。從這一點看，他們又是買辦型的。所以，這是混合型中目前還最溫和最謹慎的一格。他們可能回頭，接受歷史發展的真理，親近民族解放的主流；但也可能捲進執迷不悟，爲虎作倀的陷阱裏。這是「中間路線」的最高明的表現，也是「中間階層」的最難醫治的悲哀。

\*

\*

\*

本型中還有那些「玲瓏剔透」的文學家一流，他們從他們的「藝術之神」的殿下，時常也踱到擾攘的十字街頭來。徧身是楚楚的衣冠，裊裊的香氣，吐出來總是那麼多「典雅」蹩扭的字眼，但却告白了他們靈魂的永遠空虛。其實他們的生活靠乞討顏色得來，從那僕僕風塵的嘴臉上誰都看得明白。然而他們偏會裝得出高貴的氣派，不怕十字街頭的人們看了作嘔。指桑說槐，是他們的慣技；幫閒賣俏，是他們的耑長。中國固有的精神，他們把握不着要點；西方沒落的「文化」，他們檢着草紙當神符。寫出來是咬



文嚼字的一片窮酸，考察去只能算作寒窗的功課。最不堪的是比附名人，妄在自己的臉上貼金；裁評死者，利用那死無對證：什麼「擬隔薩利克的遺書」，比起學童的窗課來，形式上像似「擬閨怨」，「擬李陵答蘇武書」那一類體裁，實質上却遠沒有學童的那般渾樸。——文學可以墮落成爲這樣的類型，正是這社會可恥的一面的可恥反映。

最後，還有喪心病狂，求敵作父的一輩，他們挾持善良，結衆宣醜，忘記了自己是什麼民族的子孫，中國域中究竟是誰家的天下。這種人也自命是「知識份子」，那只能算作「知識無賴漢」，是士大夫與買辦混合型的最墮落的代表人了。下面不妨舉出他們集體向杜魯門請願的一節文字，看他們還知道什麼叫做「民族氣節」這一回事！

「吾人謹以中國民間團體與大學主持者之地位，向閣下保證，美國援助來時，吾人亦將盡其決心與努力，以增強……組織。吾人迫切希望，由於美國之援助，中國知識份子當能達到其……雙重目標也」。

像這種叩頭如搗蒜，乞討帝國主義市僧們的餒餘，以增長自己民族的禍害的神情，



歷史上的馮道都無此厚顏，洪承疇無此嘴臉，就算汪精衛王克敏賣身事敵的當日，對他們也要輸却幾分了。

#### 四 中國知識份子的出路

綜結本書前面的分析，這構成中國若干社會階層的知識份子，隸屬於不同的階級，其中絕大部份是出身於小康與富裕的階級的。依照目前的情況，他們的階級身份，自然大多數屬於地主、商人、企業家和官僚世家。廣大的勞動人民由於生活的遭受超經濟的壓榨，只有極少數得有受到教育的機會，知識份子中也就少有他們的蹤迹——他們一方面固然缺乏知識份子作為謀生工具的知識，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却也因此沒有知識份子所秉賦的性格弱點，和那些與社會向前發展無關的一部份知識。至於豪門巨室和他們周圍的爪牙鷹犬羣中，他們自然決不會缺少知識份子；但他們的知識份子，是赤裸裸地以知識作為聚斂財富，鞏固社會優勢的工具或武器，因之在目前條件之下他們只能有阻逆中國社會向前進步的知識，或者只肯接受防止中國進步的知識。但是他們的人數却也就只能



佔着極少的比例。

總之，中國的知識份子從中國社會裏產生，他們的來源與社會的變化具有着血肉牽聯的關係。中國社會在百年來起着異樣空前，超越歷史上任何時代的變化，中國的知識份子也必然經歷了異樣複雜的分化與轉化。因之他們的出路，必然得遵循着中國社會的出路爲出路。

誠如魯迅的名句所說：「世間本無所謂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所以中國知識份子的出路問題也就是這個社會多數人在那裏披荆斬棘英勇明智地開闢着的出路的問題。世界自從有了人類以來，永遠是那些腳踏實地，兩手操作的人，纔是真正踏路的人；那些一出世就生活在錦繡膏粱的環境裏面的少數自稱「幸運兒」者，他們根本見不着「路」，更談不到開闢出路。各個歷史時代中看見并說出社會的出路的，留下了一些知識份子的名字，這是不錯的，是知識份子的光榮。但是真正替人類開闢出路，尤其是在踏路的旅程中養育着人類的，永遠是腳踏實地，兩手操作的勞動人民，這是更重要的真理。



要用英國契爾德教授研究所得的說法，最初知識份子的出現，是在人類發現了種植生產以後，農產品可以有剩餘，需要有人作數學計算，文字登錄的時候，（見Gordon Child所著「人類創造他自己」(Man Makes Himself) 卑之無甚高論，知識份子的最初身份，不過如此而已。所謂人類的進化，知識份子盡了不少的功勞，但在實際上他們的勞績主要都在為統治者的少數階級服役，其間具體的成就保留了下來，而那因知識份子的參與，有意無意中製造過更多的罪惡，反而耽誤了人類歷史的進程，却也是歷史事實。

所以，在這裏，我們對於那些在歷史進程上，看見了并說出了社會的出路，而且忠於真理，忠於人民，不惜因此冒犯少數統治者的迫害與屠戮的知識份子，更覺得是人類的光榮，體味得出「人之所以為人」的信心與驕傲來，那就不只是知識份子這狹小圈子以內的大事了

今天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問他出身是什麼階級，不問他站的是什麼職業崗位，不問他腦子裏裝的是一套什麼知識，他們不能有一個例外，必須要看清中國社會的出路到底是什麼方向的問題。



爲了這個方向，中國人民流過海水似的分量的鮮血；中國的知識份子在默默中奉獻了他們的生命的，也構成了一個駭人的數字。這情形在我們自己的歷史上是超邁千古，在並世各民族中，規模也是史無前例。我們舊式語彙裏有所謂「旋轉乾坤」這樣的說法，今天中國社會出路的方向的問題，正合這種情況：不只我們自己的歷史要由這個方向重寫新的篇幅，爲世界穩定和平，開闢一條繁榮安樂的大路，中國也擔當着不輕的負荷。

爲了這個方向，中國的知識份子經歷了數不盡的分化與轉化，在這分化與轉化的歷程中更有數不盡的一面是堅定、忠貞，一面是遲疑、恍惚、與變節等等變化。我們所謂「分化」者是對於這個方向的理論看法的問題，而「轉化」則是在實踐生活上轉向不同的階級。這中間的複雜變化正反映出這個方向發展的曲折艱難；同時又正在這曲折艱難中產生了促進分化與轉化的因素與條件。

可是到今天，一場抗日戰爭與反專制的奮鬥由廣大人民製造了從根穩定這個方向的條件，這些條件還在繼續鞏固與發展之中，作爲出賣知識爲職業的知識份子遠遠地落在這個發展主流的後塵了。



但這並不是說，中國的知識份子就永遠跟不上這個主流；恰好相反，中國社會發展的這個主流正號召着知識份子的奔馳趨赴。正唯其中國過去流過了浩瀚的血河纔辨認出與把握到這新的發展方向，所以今天纔應該珍惜我們的光明血液不能熱狂地浪費；可是，爲了這個方向，在必要的條件下，又不能吝惜有效的犧牲。

說到這裏，就牽聯到把握這個方向的最嚴肅的中心課題：究竟要靠革命，還是靠改良，纔能扭轉這個方向？

毫無疑問地，任何問題不能憑主觀願望去解決，把握中國社會出路的方向這個關係民族發展的首要問題，更不能聽憑主觀蒙蔽了自己。——這裏有一個客觀的歷史的與社會的規律存在。

更無疑問地：這個客觀的規律，決不是死板板的條文，正有待於熱愛真理與追求光明的主觀努力纔始能夠推進發展。這裏就存在着知識份子効力的廣闊天地了。

中國近代歷史的規律告訴了我們，每當我們遭遇到社會變革的嚴重關頭，永遠有「革命」與「改良」的兩種思想在爭議辯駁，而一到革命的聲音在表面上受到壓抑時，



却也就正是改良主義的思想言論彷彿猖狂，而實質上更暴露出空虛、脆弱、偽善、卑鄙的時候，陪襯出唯有革命的主張纔是符合社會出路的真理，最爲廣大人士所真心接受。

歷史只走曲折發展的路，而是決不會走循環的回頭路的。而那教這路線成爲曲折的，正是背叛革命的階級的代表人和主張改良主義的知識份子；至於忠貞不二，堅持革命路線的，正是從曲折路線上終於發展了中國進步的革命家。

這是一切社會發展的規律，尤其是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規律。這裏面是並沒有什麼「人心思亂」的問題的——要說「人心」，只有反對革命者的人心最不堪問，改良主義者的人心，只能在這裏面扮演他們的弄臣二丑的可憐任務而已。

追溯最近五十年來的中國歷史，永遠是這一個規律在指示着我們。康有爲的「百日維新」，對於知識份子式的改良主義是達到了登峯造極的成就的典型。然而那結果則如何呢？不只孤另另地犧牲了「六君子」，那「維新」的「百日」也只留給後人一堆警惕，或者哀惋，乃至諷刺的資料。然而那「六君子」之中的譚嗣同，還留下了「要改革必須流血；要流血請自嗣同始」的名言。



辛亥革命的流產，當時改良主義者的一批名字都跟隨袁世凱走進了被咒詛被遺忘的墳墓，只留下袁世凱一個名字作爲供給後人檢討中國社會性質與社會發展方向的醜惡標誌。

「五四運動」是知識份子的光榮紀念。但從此發展着知識份子的分化，也就呈爲空前異樣的姿態。一部份展開了創造的才能，把握着改造社會與推進文化的雙重大任，繼續那啓蒙的覺醒，理解到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指趨，依附着創造社會真價的勞動人民，爲中國社會開闢了一條光明席闊的大路。這是發展的革命的路，是科學的、人民的、革命的路，是今後一切知識份子必須遵循的路。至於那誇張「文化至上」的另一部份知識份子，或者意識朦朧，一心只忙着個人的利害，（他們美其名曰「修養」）在反動的局面下追逐着個人的發展；或者強調着社會事業，躲進自我欺騙的「社會與政治無關」的迷宮。這後一類人物到今天都暴露了他們的脆弱無能乃至精神破產。而他們之中殘存的少數潔身自好之士和他們所庇蔭的中年知識份子，偏又是最多改良主義的新芽。儘管他們可能存有一副好心腸，然而一蔽於他們的階級利害，再蔽於他們的知識來源，更昧於中



國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到頭來形形色色的「改良」之聲，無非暴露了他們的懦怯與愚昧，墮入永遠失敗的「改良主義」的泥潭。知識份子的「懦怯」，是他們最大的病根；而一到知識份子而不免於「愚昧」，那可是更大的悲哀了。

今天的改良主義知識份子陣營中，那買辦型的是最不可救藥的一類。他們死心塌地一心以爲「月亮都是外國的圓」。如我們前面所說，他們抱着骷髏當天仙，「數典忘祖」，靦顏自謂得到那墮落了的「西方文化」的真傳，而咬得石頭出血，偏無視於西方文化的起死回生的新的轉向。

但是這一批人物的真面，難逃出中國人民與一切愛護真理的知識份子的眼力。他們的作用，教人一眼看得分明。

獨有士大夫型與混合型的知識份子，他們的改良主義，可能不至於像買辦型的喪心病狂。但正因爲這一點原因，他們的意見反而容易扮演在客觀上助桀爲虐的任務，愈加增添中國問題的複雜。至於有意玩弄文字意識的槍花，迷惑社會的視聽，則其罪惡，在客觀上更浮於買辦型了。



所以，擺在中國知識份子面前的中國社會與他們自身的出路的問題，是中國歷史與社會條件所規定的一條大路。這大路由中國的廣大的農民擔任了主力；但是決不是舊時歷史上改朝換代的農民暴動，而是嶄新時代的由農民擔任主力的改造中國社會的革命運動。這革命的物質基礎建築在土地制度的改革：這是貫穿着幾乎全部中國有紀錄的歷史的古老課題，但是只有在今天的條件之下，纔展開了它被科學地處理與解決的實際必然性。破壞這個改革的是些什麼力量，誰都可以看得出來是封建買辦的豪門和世界最後的一個帝國主義；而擔當與支持這個改革的却有更廣大的國內與國際的汹涌發展的民主洪流。

假如我們說，昨天的抗日戰爭是以爭取民族自主爲主題，而完成了這個主題的一份任務的正仗着同時進行土地改革的中國農民；那麼，今天的形勢，是倒轉來以澈底完成土地革命爲主題，而這個任務的實現，自然也就解決了新形勢之下的民族危機。這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刀雙刃，是中國人民提供到了世界性的範圍的真理，成爲世界新歷史上的重要篇幅，說不上有絲毫懷疑了。



中國的知識份子最能知道什麼是中國農民，他們不只從傳統文化上浸潤了「天視自我民視」的封建性的真理，今天他們更親切地體驗出中國農民的英勇明智，足以擔任扭轉中國歷史的大任而無愧，不只空留着舊時代「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的保守性的教條了。

但這意思決不是說，中國問題除了這個土地革命的主題以外就沒有問題，這裏就存在着中國知識份子的莊嚴任務，中國歷史的創造正號召着他們和血帶肉的參加。大家常說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這一句話，其實正就是舊話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這樣的情境。中國讀書人素來最重視「慎獨」「不愧屋漏」這樣的修養，今天這些修養已經不是空洞的道德信條，而是生活的必需了。

「不矜不伐」「無怠無荒」，把握着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配合着自己的一份聰明才力，今天已經是無時無地不是知識份子報効國家，報効人民的時候了。

中國知識份子用不着誇張知識的虛驕，也用不着貶損知識的真價。他們也有他們的一份腳踏實地兩手操作的範圍；大家向着一個目標，爭取與土地改革有關的一切問題的



推進，爭取中華民族的真正獨立與自由。時代與人民到處都在啓發他們努力，啓發他們的聰明；最科學地最有效地善用他們的知識與胸襟，這就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出路。

中國知識份子用不着誇張知識的虛驕，因為扭轉中國歷史的力量並不寄託在他們身上。不只正面的力量不能憑藉他們，就在反面的力量裏面他們只是醜惡的陪貳之臣。這是社會發展的法則，知識份子用不着沮喪感傷的。

中國的知識份子曾經受過封建皇朝的玩弄性的優遇，那叫作「刑不上大夫」；今天知識份子的境遇該是如何？

英勇明智的中國廣大人民正在向知識份子伸出友誼的手，他們沒有罪惡豪門的財富供應，但他們却洋溢着趨向光明，辨別是非的馴良誠樸的心。

中國知識份子的出路，難道還留有絲毫矇矓的餘地麼？



\*\*\*\*\*

新認識  
叢書之二

# 論優生學與種族歧視

周 建 人 著  
基價二元四角

優生學，如本書作者在序裏說：『它非常錯誤地常常對國內把社會裏受壓迫而地位低落的人看作遺傳性低劣，把壓迫者看作遺傳性優秀者；對國外，把壓迫民族（或種族）看作優秀民族，被壓迫民族為低劣民族來立論，影響所到，遂對內替惡毒的統治者，對外給兇殘的帝國主義做了辯護士與代言人……』

這一種學說，使有些人的思想混亂，有些人則嚴重中毒。本書作者用極正確的生物學觀點予以駁斥，並指出它的錯誤所在。

本書共分六章：（一）論優生學的政治性（二）論優生學中的遺傳問題（三）論個人性質與社會條件的關係（四）論所謂優良家族與劣等家族（五）論種族歧視（六）達爾文學說應用到人類社會上來的錯誤。



新 知 書 店

發 行

\*\*\*\*\*



101300120

\*\*\* \*\*

新認識  
叢書之一

# 論胡適與張君勱

夏康農著  
基價二元四角

這是一冊有益而富於啓發性的小書。作者在小序中說：「胡張兩位博士在思想以及對於「文化」的看法上，本來是居於背道而馳的兩極；今天在政治行動上他們可是沆瀣一氣，融和無間。……兩位博士一位已經是「制憲」專家，一位可能是將來「行憲」的大吏，此地兩「賢」合傳，應當是件「美」談。」

本書集「論胡適」及「論張君勱」兩篇而成；前篇內容包括（一）前言（二）論其人的特性和通性並勾畫輪廓（三）「拿證據來！」（四）結論。後篇內容包括（一）破題（二）起講（三）尾聲。



新知書店 發行

中華民國玖壹年玖月廿叁日贈送

\*\*\* \*\*







國家圖書館



002432676



. 113

9

籍

定價

.40